

乔纳森·休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审视及生态启示 ——以需要为视角的分析

于 萍

摘 要: 西方环保主义者认为, 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需要概念暗含着反生态的倾向。针对环保主义者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指责, 当代著名的环境伦理学家乔纳森·休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生态辩护和生态阐释, 并指出马克思的人类需要概念具有生态可持续性。虽然休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辩护存在着不足之处, 但是, 研究休斯以需要为视角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审视, 不仅为我们解读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态思想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而且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生态启示。

关键词: 休斯; 历史唯物主义; 需要概念; 生态审视; 生态启示

中图分类号: B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0)06-0097-08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0.06.009

人类需要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非常重要。需要的满足与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马克思认为, 人的解放建立在需要的满足与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但是, 马克思关于丰裕未来的设想和需要与生产力发展的承诺, 同环境保护主义者的信仰和价值观相冲突^{[1](P5)}。因此, 在他们看来, 马克思对人类需要的理解不利于自然的发展与生态的和谐, 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需要概念暗含着反生态的倾向。针对西方环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指责, 当代著名的环境伦理学家乔纳森·休斯(以下简称休斯)对此展开了辩护, 并指出马克思的需要概念不仅不是反生态的, 而且具有生态意义。他进而指出,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主义不是敌对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可以作为研究生态问题的一种有用框架”^{[1](P3)}。因此, 研究休斯对历史唯物主义中需要概念的生态辩护与生态阐释, 不仅为我们解读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态思想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而且为当代生态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些有益启示。

一、西方环保主义者对需要与生产力增长的反生态批判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 需要的满足与新需要的产生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是, 西方环保主义者认为需要的无限增长会引发生态问题。因此, 他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人类需要概念。例如, 将马尔萨斯关于限制人口增长的观点应用到环境问题中的“绿色马尔萨斯主义者”^{[1](P49)}戈德斯密斯等人在《生存的蓝图》中指出: “这个世界无法承受生态需求上这种持续不断的增长。”^{[2](P17)}米都斯等人在《增长的极限》中也指出: “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

基金项目: 辽宁省教育厅青年科技人才育苗项目“分配正义视阈中的‘需要’原则研究”(WQ2019009)

作者简介: 于萍, 哲学博士,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yu_ping0105@163.com (天津 300350)

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3](P19)}《增长的极限》在全球问题的视角下，表明了人口增长是引发生态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休斯解读为，“这篇报告的作者们像马尔萨斯一样认为，呈指数速率增长的需求和有限资源的结合，正削弱着人类需求满足的可能性”^{[1](P60)}。因此，有必要限制人类需要的增长。而马克思赞同人类需要的不断丰富扩大，生产力也随之不断增长，这是环保主义者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认为地球承载不了这种无限的“扩张”，所以对马克思的需要与生产力的无限增长提出了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4](P32)}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5](P389)}这两段论述表明马克思认为需要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增长的，而新需要的满足又促进了生产力的增长，需要也一定会随着生产力的增长和发展而不断扩大和丰富的。这些观点正是环保主义思想家所批判的，他们认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不能为了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要而去消耗有限的资源，甚至超出自然的极限。因此，要限制人类需要的增长，不能为了人类需要的满足而去破坏自然界。例如，乔纳森·波里特在论证环保政治的明确特征时就表达了这一观点，“如果你想要一个绿色政治和传统政治的简单的区别，那就是，我们认为量化的需求必须缩减而不是膨胀”^{[6](P136)}。奈斯和塞申斯提出的深生态学八大基本原则中有一条也指出，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无权减弱自然界生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除非是为了满足重大需要^{[7](P242)}。

不仅如此，由于人类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生产力也会随之发展。环保主义者认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将导致生态问题的恶化。如本顿就指出：“劳动过程的操作所导致的自然调节的无意识后果，可能妨碍到它的环境条件和/或原料的持续存在或者再生。”^{[8](P73)}生产力要素中的劳动对象的增加和劳动资料的改进都会直接影响到生态环境。从劳动对象来看，无论是直接的自然物还是经过人类劳动改造过的物体，都要使用到自然资源。因此，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就意味着将要从自然获取更多的资源。从劳动资料来看，劳动资料的改进体现着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的增强，而不去考虑可能会给自然带来的有害后果。由于“马克思的绿色批评者经常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技术决定论，这表明他们把生产力的发展（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决定因素’）等同于技术的发展”^{[1](P180)}，而新技术可能并且经常会不仅对自然资源有更多的浪费，还会给环境带来更多的污染，从而会引发更大的生态恶化。例如，瓦尔·罗特莉认为，马克思提供给我们的“自动化天堂”的蓝图“必定是高度耗能的，因此展现了可预见的、现实的能源情景，即环境破坏”^{[9](P242)}。因此，休斯指明，环保主义者普遍认为生产力的发展蕴含着具有生态问题性因素的扩张^{[1](P179)}，并反对这种物质生产的永久性扩张。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会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走向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并实行按需分配的社会，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0](P305-306)}绿色思潮反对需要与生产力的无限增长，由此也批判共产主义与按需分配的反生态性。“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因为它所宣称不断扩大人民的需要，发展生产以满足这些需要而受到批判”^{[1](P174)}。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没有看到自然的限制，缺少对自然的敬畏，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马克思提出的按需分配根本不可能实现，按需分配“遭到了那些把共产主义口号作为提供无限消费的‘空白支票’的绿色批评家的抵制”^{[1](P241)}。有些环境评论家认为，即使早期的马克思看到了人对自然的依赖，但是后来马克思也

放弃了这种想法，技术决定论使他更注重人对自然的影响和控制。彼得·狄更斯认为，马克思晚期著作没有能够发展他早期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11](P14)}，唐纳德·C·李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贪婪的、暴力的和破坏自然的，除非通过该人道主义的观点改造它们”^{[12](P314)}。可见，环保主义思想家们对马克思的需要概念、共产主义以及按需分配都是持批判态度的。

二、休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审视

面对西方环保主义者从需要视角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休斯反对需要概念是反生态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的人类需要概念不仅不是反生态的，而且具有生态意义。环保主义者之所以得出如此的结论是因为其对马克思的著作做抽象化、简单化的理解，并没有理解需要概念的真实内涵。休斯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采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式，旨在澄清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些概念，尤其是人类需要及其相关概念，阐发其生态蕴含。因此，休斯重点分析和诠释了马克思的需要概念，以回应西方环保主义者对马克思需要概念及生产力与共产主义的生态批判。

休斯指出：“人类需要的概念对理解马克思的广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唯物主义理解与他的狭义的历史理论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1](P173)}。因为需要，人与自然开始了物质交换，也开始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占有。由于受到马尔萨斯的影响，环保主义者认为需要的增长与自然的限制二者的矛盾不可调和，并批判马克思的需要无限增长的观点。因此，休斯对其的回应也从自然限制开始。他追溯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指出：“人口增长必然受到生活资料的限制”^{[13](P8)}，所以他提出采取“抑制”的手段来达到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平衡。休斯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批判“马尔萨斯为济贫所辩护、掩饰贫困的真正的原因并把贫困当做‘人类永恒的命运’”^{[1](P69)}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动机，而且否定了人口的增长及人类需要的增长一定会增长至资源的短缺这一观点。因为自然限制“不单是自然作用的结果，而是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结果”^{[1](P80)}，人口的增长和需要的增长也不是抽象的纯自然过程，而是社会、历史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马尔萨斯的错误就在于他抽象地理解自然限制、人口增长和需要的增长几个概念。

休斯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处理需要的增长与自然的限制二者矛盾的时候，运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式，采取的是辩证的态度，“他们并不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而依赖生产的无限扩展。恩格斯对马尔萨斯批判的关键在于马尔萨斯提到的生产的限制没有达到”^{[1](P77)}。因此，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需要的增长与自然限制之间存在矛盾；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这个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因为无论是需要的增长，还是自然的限制都不是绝对的、抽象的，而是相对的、历史的。从马克思写作的时代来看，自然的限制（生产的限制）还没有到来。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当‘密士失必河流域尚有足够的荒地可供欧洲的全部人口移居’的时候，当地球上的土地才耕种了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的土地只要采用现在已经是人所共知的改良耕作方法，就能使产量提高五倍、甚至五倍以上的时候，谈论什么人口过剩，这岂不是非常可笑的事情。”^{[14](P621-622)}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时代，人类不断增长的需要还远没有触到自然的限制，并且这个限制会随着未来科学的进步而推迟它的到来，虽然它还不能完全消除。然而，马克思要强调的问题不是自然无法满足需要的增长，而是社会无法满足需要的发展，或者说，一些人的需要（甚至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无法得到满足就是这个社会造成的。这不仅在马克思的时代存在这样的情况，而且在当代仍然有一些人饱受饥饿的痛苦，食不果腹。但是，另一些人的需要却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中变成了欲望，无限增长、欲壑难填。这并不是真正的人的需要，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培养出来的虚假需要和欲望，“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要机敏地而且总是精打细算地屈从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15](P120)}。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需要和欲望，需

要的历史增长并不具有生态破坏性，而且受到实际的或潜在的生态问题的影响，人们还会增长出生态需要，例如关于健康美观环境的需要，生态需要的出现和满足无疑对环境是有利的。因此，休斯认为，在考量马克思的人类需要概念对生态的影响的时候，不仅要区分需要与欲望、真正的需要与虚假的需要，还必须考虑需要在其质量以及数量方面的作用^{[1](P231)}，分析需要的社会性与历史性，不能妄加断言。

在马克思的时代，自然限制还远未达到，但是即使会遇到自然限制的迫近，马克思的解决方式也一定不是抑制人的需要，而是改进和发展生产力。休斯指出：“即便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付出巨大的人类代价，马克思自己仍对生产力发展给予了积极的评价。”^{[1](P176)}生产力的发展减轻了劳动的强度并减少了必要劳动时间，给人们自由的创造性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因此，不仅人们的需要得到了满足，而且人们又会发展出很多新的需要，这些新的需要更能体现人的本质力量。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虽然以异化的形式推动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但是它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也为未来的社会创造了前提条件。生产力的发展尽管在马克思看来有诸多好处，但是绿色理论家却坚决反对它的无限增长，因为它会导致自然环境的破坏。但是，马克思对生产力发展的支持就代表他也会支持具有生态破坏性的发展形式吗？

休斯认为二者没有必然联系，理由有二：其一，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应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都会受到破坏，所以马克思认同人们会更倾向于共产主义并且推翻资本主义的桎梏这个视角^{[1](P205)}。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实现更普遍的人类福利、全人类的解放，所以没有理由认为“共产主义将要从从事或者应该从事不加选择的或者具有生态破坏性的生产技术的发展或使用”^{[1](P205-206)}，因为这是对人类有害的，与马克思的本意相违背。其二，马克思虽然支持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并且希望它能够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走向能使其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如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这种生产力的发展会引起生态方面的问题，马克思不会不顾及人类的生态环境而继续追求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已经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土地资源的破坏，“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16](P579-580)}。因此，马克思支持生产力的发展并不代表他会不顾及生态环境而支持具有生态破坏性的发展。

针对环保主义者对技术决定论和新技术会带来更大的生态问题的批判，休斯指出，首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绝不是技术决定论。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技术决定论，表明他们“仍停留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一种误解”^{[1](P104)}。针对类似的误解，恩格斯也明确试图反驳过，他指出，尽管“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17](P732)}。因此，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中，技术的发展应被理解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而不能被当做决定因素。其次，新技术也不一定会带来更大的生态问题。新技术是否会造成更大的生态破坏，关键要看科技工作者在对新技术研发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了生态因素。如果考虑到了生态因素，就会尽量控制其生态影响，发挥其生态效能。发展生产技术中的生态效能会大大降低生态破坏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对技术的不合理利用和对技术得以发展形式的限制，使技术的生态效能的潜力很难实现。可见，在生产力发展中对技术发展的生态定位能达到怎样的程度，还是要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中的利益结构。代表全人类利益的共产主义社会决定了它的生产力发展会比资本主义社会以一种更加良性的方式发展，这将更有利于生态。

前文提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生产力发展与按需分配的论断^{[10](P305-306)}被绿色理论家质疑不具有生态可持续性。休斯指出，这一论断“并没有内容表明马

克思支持产出的一个无限增长”^{[1](P211)}。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这段共产主义描述虽然提到了集体财富的充分涌流，但只是强调富足的生产是实现共产主义和按需分配的必要条件，否则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4](P39)}。因此，这并不是可以指责共产主义具有生态不可持续性的充足理由。生产的增长不能等同于生产的扩张，即使是进一步扩大的物质生产，也不一定会导致生态恶化。前文已经指出，生产技术中生态效能的提高可能会比以前带来更好而不是更差的生态影响。因此，休斯认为，共产主义要想满足人的需要，就必须以发展生态效能的形式发展生产力^{[1](P211)}，这不仅会避免生态的进一步恶化，而且还会保证人类正常需要的满足（包括生态需要的满足）不受环境恶化的威胁。

可见，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真正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并实行按需分配原则在马克思看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理解按需分配的，是否真如环保主义者所批评的那样，认为它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这一原则也不具有生态可持续性？对此，休斯也对按需分配进行了生态辩护和解读。首先，休斯认为，按需分配的“需”指的是人的需要，而且是真正的需要，而不是欲求，也不是虚假的需要。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该口号的使用仅限于‘真’需要的范围内”^{[1](P241)}，而不是被资本主义生产所唤起的虚假需要和欲望。休斯强调，不管马克思是否指望他的“按需分配”理论能够被人们所理解，但他确实没有指望它会被理解为一个个人恰巧拥有的任何要求或“欲求”^{[1](P236)}。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像他的绿色批评家所假设的那样，把按需分配解释为按照人们的欲求进行分配。其次，按需分配不是指所有需要都能满足，但是至少要在实现每个人的需要满足的某种最低水平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个原则，否则只会导致粗陋的共产主义，形成一般的欲望。最后，不能把按需分配简单理解为一个分配原则，因为马克思反对的不是物品分配的不公，而是对人的压抑，共产主义要追求人的真正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是对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的超越。因此，以按需分配为原则的共产主义不仅不会导致生态恶化，反而会为人类未来的生态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指出一条明路。这里如何理解人类需要概念的生态可持续性就成了问题的关键。

三、马克思需要概念的生态可持续性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所理解的需要不是抽象的需要，而是历史语境中的需要；需要的增长也不是无限的扩张，而是历史的发展。休斯认为，马克思的人类需要概念具有生态可持续性，“这一人类需要概念在生态上是可持续的”^{[1](P278)}。休斯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对马克思人类需要概念的生态可持续性作了以下几个方面诠释。

首先，马克思肯定人对自然的需要和自然对人的重要意义。自然是人类共同活动的前提，自然界从两个方面满足人的需要：一方面，在实践领域，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来满足自身的肉体需要；另一方面，在理论领域，自然还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和艺术的对象满足我们的精神需要。“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15](P56)}因此，自然不仅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源泉，而且其本身就是人类最重要的需要。人离不开自然，依赖自然，因为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所以，人类不能为了满足其他的需要而无视自己的身体甚至毁坏自己的身体，这不仅关系到人的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人类怎样对待自然，自然就怎样对待人类。对此，人类应该有所警觉，“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7](P383)}。所以，人要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想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要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人怎样对待人，就怎样对待自然。因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其次，马克思认为自我实现的需要才是人类真正的需要。休斯指出：“自我实现的需要是马克思理解人类需要的核心。”^{[1](P268-269)} 真正的人类需要既区别于动物的需要，也区别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被异化的需要。真正的需要是超出直接的肉体生存的需要，在生产活动中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需要，当然，也包括与人交往的合作的需要。因为人的自我实现、创造性的活动离不开人的社会性，就是人的社会化的活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需要却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在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工人被当作动物对待，只限于满足可怜的肉体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需要变成了占有的需要，与欲望混淆不清。私有制使人变得自私、愚蠢而又片面，生产就是为了占有。就连对自然的需要也变成了对自然的占有和控制，为了满足自私的需要而不顾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浪费。而这一切都起因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马克思认为，对私有制的扬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5](P81)}。所以，真正的人的需要即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并不一定会消耗更多的资源，反而会通过人类智慧的运用增加资源的利用率，以生态良性的方式满足人类增长的需要。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预言的那样，联合起来的生产者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18](P928-929)}，实现人类的真正需要。

最后，马克思理解的人类需要的增长是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休斯指出，马克思所理解的“需要增长似乎并不只是从需要满足的一个水平到另一个水平的离散步骤，而是一种持续的发展”^{[1](P260)}。而且这种需要的增长是真正的人的需要，即自我实现的需要，它的满足不论是在生产过程之中或之外，都“并不必然以资源消耗的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态问题的恶化为条件”^{[1](P283)}，而是更注重它的创造性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更重质量而不是数量，目标是全人类的繁荣发展。因此，持续发展的人类需要的满足必然要求可持续发展的生产，而不是无限扩张的生产。

四、生态启示

综上所述，休斯对历史唯物主义中人类需要概念的生态辩护与生态诠释不仅有力地回应了西方环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批评和曲解，而且阐发了马克思需要理论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内涵及生态意义。但是，休斯的诠释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为了反驳环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批判，休斯站在生态辩护的立场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也存在过度诠释之嫌，并且他对辩证法的认识存在着局限性，“转而采用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科恩的功能分析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功能主义解读”^{[19](P43)}。尽管如此，休斯以需要为核心概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审视还是为当代生态问题的解决及生态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一，在生态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中要注意需要的可持续性与生产的可持续性。休斯在分析按需分配与需要概念的可持续性时，都明确指出，我们要将需要与欲求、真需要与假需要区分开来。真正的需要是在与人合作中所体现的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个需要是具有生态可持续性的，它的满足也要求相应的生产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它是有利于生态建设的，是人们未来要努力发展并促其实现的需要，而那些欲求、假需要无疑是具有生态破坏性的，可能要消耗大量的生态资源，要坚决抵制。针对有些地区连基本需要都没有解决的问题，休斯指出，“为了避免由此加剧生态问题并破坏这些或其他需要，基本物品供应量的增加要通过再分配与（假设这是不够的）技术创新的某种结合来实现”^{[1](P286)}。

第二，在生态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要对人们的生态需要及其满足足够重视。休斯指出，需要的历史增长并不具有生态破坏性，而且受到实际的或潜在的生态问题的影响，人们还会增长出生态需要，例如关于健康美观环境的需要。生态需要的出现及其满足无疑对环境是有利的。在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阻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甚至已经严重威

胁到了人的生存。因此，生态需要的满足对人们来说尤为迫切。十九大报告也指出：“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20](P11-12)}可见，生态需要是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生态需要的满足需要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努力，而且人们势必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也是生态建设的内驱动力。

第三，在生态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中要重视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与技术因素相结合。休斯在回应受马尔萨斯人口论影响的环保主义者批评马克思无视人类需要与自然限制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与马尔萨斯在生态限制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认识。马尔萨斯在阐释自然限制的时候忽略了社会因素（而且是在社会因素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而高估了自然因素的危险^{[1](P589)}。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每个因素的作用以适当的思考”^{[1](P89)}，承认三者的相关性。因此，对生态限制的研究，应该把三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在社会因素方面，社会结构决定着人们对自然的态度和生态技术的发展潜力，自然因素也不是孤立的，要受到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的影响，而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也是互相影响的。因此，在生态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既要考虑社会因素与技术因素对自然的影响，也要考虑三者的有效结合，选择一种综合治理的生态途径，我国在五位一体的视域中建设生态文明就是一种很好的体现。

因此，马克思的人类需要概念的核心是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人的自我实现包含着人的物质、精神、政治、文化、生态等全方面需要的实现与满足。所以，马克思的人类需要概念不仅具有生态意义，而且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直接体现。因此，马克思的人类需要概念及休斯对其的解读不仅对当代生态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而且使我们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 [英]乔纳森·休斯. 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M]. 张晓琼, 侯晓滨,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 [2] Goldsmith, E., R. Allen, M. Allaby, et al. *A Blueprint for Survival*[M]. London: Tom Stacey, 1972.
- [3] [美]丹尼斯·米都斯, 等. 增长的极限[M]. 李宝恒,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6] Porritt, J. *Seeing Green: The Politics of Ecology Explained*[M]. Oxford: Blackwell, 1985.
- [7] [美]戴斯·贾丁斯. 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第三版)[M]. 林官明, 杨爱民,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8] Benton, T. 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J]. *New Left Review*, 1989.
- [9] Routley, V. On Karl Marx as an environmental hero[J]. *Environmental Ethics*, 1981.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1] Dickens, P. *Society and Nature: Towards A Green Social Theory*[M].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2.
- [12] Lee, D. C. On the Marxian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J]. *Environmental Ethics*, 1980.
- [13] [英]托马斯·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M]. 朱泱, 胡企林, 朱和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 [15] [德]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1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 [1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 [1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 [19]铁省林. 人是依赖自然的——乔纳森·休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捍卫和建构[J]. 东岳论丛, 2014(8).
- [20]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Jonathan Hughes' s Ecological Examin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ts Ecological Enlightenment

—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ed

YU Ping

Abstract: Western environmentalists believe tha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specially the concept of need, implies an anti-ecological tendency. In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ists' accusations against Marx' 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Jonathan Hughes, the famous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ethicist, made ecological defense and ec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pointed out that Marx' s concept of human needs was ecologically sustainable. Although Hughes' s ecological defens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its shortcomings, the study of Hughes' s ecological examin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ed not only provides us with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interpreting the ecological thinking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ut also provides a useful ecological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Hugh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cept of need; ecological examination; ecological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 孙 洁)